

北京大学历史問題講座

第四講

从考古学看中日^古文化的关系

原田淑人講

3039

4462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历史問題講座

第 四 講

从考古学看中日古文化的关系

原 田 淑 人 講

高等教育出版社

389
421

389
421
4462

北京大学历史问题讲座
第四讲
从考古学看中日古文化的关系

原田淑人讲 姚璧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宣武门内承恩寺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1号)
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统一书号 11010·38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16 字数 6,000 印数 (0001—2,000)
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7) ¥0.04

从考古学看中日古文化的关系

这次我們受到中国科学院的邀請，在日本考古学协会和毎日新聞社共同發起之下，組成日本考古学訪华考察团，来到中国。四月十七日到广州，一路上參觀了杭州、上海、苏州、南京、曲阜、济南各地博物館、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單位所收集的最近出土的文物。廿九日到达了怀念已久的北京。所看到的文物很多，不能不重新考虑我們以前的一些想法。各博物館的陈列，都是从旧、新石器时代到明清各时代，仔細地把文化进展的过程用实物一目了然地陈列出来，使我們非常佩服。中国文献史籍世界第一，又有这样多的地下文物，我想由新从地下出土的資料还可以編写成一部考古学的廿五史。中国的考古学在六、七年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很大發展，我們在这里向中国考古学界表示最大的敬意。同时，作为日本考古学者，尤其希望中国考古学者諸位指教。站在这样盛大的講座的講台上，实在是我一生的光荣，同时也感到实在当不起。

1930年，我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講过和今天相同的題目。二十七年后的今天，又在北京大学来作这个講演，真感到有如作夢一样。

日本考古学所研究的范围，一般是以美术史上所說的飞鳥时代以前为下限，可是我相信直到飞鳥、奈良兩时代，还應該包括到考古学的重要活动范围之內。

首先，在日本还没有發現肯定的旧石器时代的遗迹、遺物，可是近年各地都發現有無土器(陶器)时代的石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关于旧石器的問題，日本也能够参加到世界的学术界中去。

至于新石器时代，离現在八十年前，这方面的研究开始走上了

科学的軌道。与現在中国用彩陶、黑陶、灰陶等陶器作为断定文化的时代的标准一样，由新石器时代到初期金屬时代，我們同样用陶器（日本叫做“土器”）来区别时代的特征。最初是繩紋式土器，这是由于在土器的表面印有繩紋的印痕而得名。使用这种土器的时代相当長。就現在的研究來說，分为前、中、后三期，或分为早、前、中、后、晚五期。以这种繩紋土器作代表的文化在东部日本延續的时间比較長，在西部日本，弥生式土器很早地代替了繩紋土器而出現。所以叫“弥生式”，是由于最初發現的地方是东京都文京区的本乡弥生町。弥生式土器很早在西部日本代替了繩紋土器，但它的年代的上限不大明确，想来恐怕应在公元前三世紀左右。繩紋土器时代的文化究竟是日本島上自然發生的呢？还是与大陆方面有什么联系呢？这还是問題。其次，弥生式土器的时代也大略分成三期，其中期正相当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后一世紀。此时，日本进入金屬时代，开始与中国文化發生了关系。

日本以“倭”的名称为中国人所知，是从汉武帝在朝鮮置四郡开始的。在这以前，从中国的战国时期起，中国人已有很多移住朝鮮，帶进中国文化。可是到了汉武帝时代，就大量移民了。四郡中以平壤为中心，長时期繁荣的是乐浪郡，倭人是与那里交通，接触到大陆文化的。“前汉書”“地理志”开始記載倭国之名。当时日本倭国分为許多部落，还没有統一，但最开化的地区应当是北九州。福岡县和佐賀县發現多数用甕和甕合成的甕棺，并且有隨葬的銅劍和銅鉞（矛）出土，而且一个地方有前汉时代的銅鏡同时出土，因而大体可以推断其实际的年代。甕棺中国叫做“瓦棺”，根据文献的記載，瓦棺主要是用来埋葬未成年的遺骨的。但近年也發現埋葬大人用的瓦棺了，因而可以考虑它与日本甕棺間的联系。近年石桌墳（石棚）也發現了（石桌墳有的用石板組成箱狀，其上安置平的板石如桌狀，有的在四边的石头上安置平石塊。北九州的石桌墳与南朝鮮的相同，属于后边的一种。），这种石桌墳朝鮮也有，

中国也早已發現，关于其間联系問題的解决，对于中国考古学的成果抱有很大的期望。

和北九州的銅劍，銅鉞(矛)大略同时代，分布在畿内附近的有銅鐸。銅鐸类似中国的鐸，但是一种自古以来用途不清楚的珍奇金屬器。像前边談到的那样，在朝鮮半島有过兩次中国文化的傳入。一次是汉武帝設置四郡(尤其是乐浪郡)以前傳入的旧式的中国文化，另一次是所謂乐浪文化的新式中国文化。前者与中原本土文化相当不同，有地方色彩。銅劍和銅鉞(矛)等在当时無宁說是属于旧式的中国文化，与之相伴的前汉式銅鏡想来不外是从乐浪附近傳入的新式文化。朝鮮也有类似銅鐸的馬鐸，所以，这也似乎应当属于由朝鮮傳入的中国旧式文化。并且与銅鐸和銅劍等同时出土的有一种叫做細綫鋸齒紋鏡的特殊銅鏡，分布直到朝鮮，可以看出其联系。在鏡的背面，鋸齒紋細刻成放射綫狀，又在鏡背中心的略微上部，并列兩個鈕，表現这种銅鏡好像是連結在什么上的。这种銅鏡和銅鐸也許是有宗教的用途。除了上面提到的銅制品外，北九州还出土琉璃璧，也是与中国文化关系上最值得注意的，我想这不就是中国由战国时代到汉代重視的夜光璧嗎？中国的琉璃器从东西文化交流上看，我想是很有趣的。

像前边說过的，倭人和朝鮮的乐浪郡交通，并且以乐浪为中介，也到了汉的本土。住在九州博多附近的倭人的一个部落——倭国，派出使者到洛陽的时候，后汉光武帝送倭国国王以黄金印，这件事見于历史記載；并且在离現在 170 年前，在博多灣的一角發現了刻有“汉倭奴国王”銘文的黄金印，这是相当有意义的。此印日本当作国宝保存着，現藏在黑田家內。从以上所講，由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后一世紀中日文化的交流，銅劍、銅鉞(矛)等都是由中国东北地方傳到日本的，这是很明确的，但在中国分布如何，希望中国学者在現在的成績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以便將來能有所了解。

其次到了公元三世紀，倭人与三国的魏交通，这个时候，因为

在日本出現了封土高大的墳墓，考古學上把古墳出現以後公元三世紀到五、六世紀左右的時期叫做古墳時代，這也分成前、中、後三期。根據“三國志”“魏志”“倭人傳”的記載，由魏天子贈給倭女王銅鏡百枚，又倭女王也拿青大勾珠和其他的產物贈給魏天子（青大勾珠恐怕即是从日本古墳中發現的青色翡翠制的大勾玉），這種互相贈送，一方面是物產的交易，另一方面又是文化的交流。至於“魏志”“倭人傳”所記倭女王的邪馬台國是在北九州呢？還是在畿內的大和呢？到現在還無定論。但這時中日文化已有了交流，是沒有問題的。日本前期古墳發現的魏和吳的銅鏡當中，有魏和吳的紀年銘文。現在這種三國時代的銅鏡，發現了數百枚，當時彼此之間有了交易是很明白的。“勾珠”是日本固有的珠玉，翡翠制的，從繩紋土器時代已經存在了。古墳時代的許多翡翠“勾珠”，其形制是完整的，色彩是鮮明的。翡翠制的“勾珠”一直到奈良時代還繼續存在，在正倉院的金銅幡上還懸垂着。至於翡翠的產地，以前總想像是在緬甸，翡翠從緬甸經中國南部輸入到日本來的，但最近在新瀉縣絲魚川上流的姬川，發現了它的原石料，又在其附近的新石器時代的遺迹中也發現這種翡翠的原石料，由此可知，至少新石器時代的翡翠制的“勾珠”，已是用日本產的原料了。這種翡翠石青色部分少，不是很上等的。古墳時代青色鮮明的翡翠制的“勾珠”，它的原石料在日本什麼地方有呢？還是為日本近鄰所產呢？在中國或者能發現也未可知。

在這兒，需要說明一下，日本古代人認為銅鏡是可以辟邪的，這種想法在中國古書中的“抱朴子”中也可以看到，但首先，中國說到銅鏡總把它看作是化粧用具之一，從樂浪等處漢墓所出土的銅鏡來看，它是裝在鏡奩中，跟其他飲食器具等放在一塊。但在日本却有許多放在遺骸的頭、胸、腹等部，這恐怕是反映日本對銅鏡的獨特的信仰吧。又一座墳墓內往往埋藏着許多銅鏡，從這點可以看出日本人多么珍視銅鏡，也許把銅鏡看成富有的象征吧。這些

銅鏡不仅从中国輸入，在日本很早就开始仿造了，可以想像日本人对銅鏡的欲望和要求是多么大了。

中国的銅鏡由于时代的不同，各有其特征。三国魏和吳的銅鏡，我們叫着“神兽鏡”，因为在銅鏡背面鑄有神仙和灵兽配合起来的花紋。但是，日本古墳出土一种“三角緣神兽鏡”，这种神兽鏡在朝鮮和中国都还没有發現过。可是其中有的有中国文字的銘文，这究竟是从什么地方輸入日本的？由中国傳来的呢？还是日本創造的呢？現在還沒法断定。这也是最需要中国考古学界的帮助才能解决的問題。

在古墳时代的前期，中日文化的关系可以明显的看出，但当时日本人只輸入他們所要求的中国制作品，却还没有达到关心中国文化的总体的程度。武器和銅鏡是輸入的对象，像乐浪墳墓中埋藏那样多的漆器，在日本古墳中，却未曾出土过一件，这种情况不是傳達了其間的消息嗎？但是腐朽后不留一点痕迹的絲織品等的輸入，也許有也未可知。

从公元四世紀經過五世紀到六世紀左右，也就是从古墳时代的中期到后期，中日文化的关系，和以前完全变样了，这不用說是中国文化的大量輸入。从四世紀末左右到五世紀，朝鮮的形势完全变化了。当时朝鮮三国，就是北边是高句丽，西边是百济，东边是新罗，鼎立的形势已形成。高句丽漸漸擴張势力，百济受不住它的压迫，与日本协力来对抗它。在这以前，日本即伸張它的势力到朝鮮半島上来，其間文化的交流也盛行起来。因为高句丽的勃兴，日本常常怕从朝鮮半島被驅逐出去，所以援助百济来防御高句丽。当时高句丽和北朝(北魏)相交結，断除后顧之憂，企圖向南擴張势力。于是，日本和百济同与北朝敌对的南朝(宋)修好，来牽制高句丽。这个消息可从“宋書”“夷蛮傳”推知。这样的政治形势在文化方面也引起了極大的反响。五世紀时，日本天皇尤其是雄略天皇(“宋書”的倭王武)屢次派遣使者交結国好。当时把南朝

(宋)称作吳,日本讀作「クレ」(Kure)。日本使者从刘宋帶着叫做“汉織”、“吳織”的織絹的女工和“衣縫女”(裁縫师)等回国,特別优待这些工人,鼓励了日本的养蚕業,这些見于“日本書紀”。日本的絹布等,从这时起,大約也就發达起来了。

由于这样的国际形势,日本不仅从百济,而且直接从中国南朝輸入中国文化。因此,在日本的衣食住等生活方面,引起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日本書紀”,居住方面既营造了楼閣建筑,食器方面又使用了“須惠器”(日本古代使用的一种陶器)。而且,“衣縫女”即裁縫师从中国渡来,这不外意味着日本的衣服也有了中国風(中国式)。若从后期古墳的出土品来看,“須惠器”与以前的弥生式土器和与它相連接的“埴器”(后于“須惠器”的一种日本古代的陶器)不同,其質地堅韌,因为当时朝鮮和中国的南北朝都大体使用过这种陶器,所以日本也傳入了这种陶器的技术。

这时候的衣服,根据埴輪人物像(埋在墳墓封土內四周的陶俑裝飾,这种埴輪人物像的取意是侍候死者的)可以知道男的上身穿筒袖的衣,下身穿褲,女的上边同样穿筒袖的衣,下身着裳(裙),和大陆的風俗沒有大差別。

其次,后期的古墳中出土須惠器,为一特色,另一特色即此时期的埋藏品中出現鑒金的华丽的裝身具和馬具。裝身具之中,有“环头大刀”,裝飾美丽,在刀柄头有銅环,其中透雕龙和鳳凰,然后再施以鑒金裝飾。根据“唐六典”,这明明是这时候使用的一种仪式用的刀。我在新罗的遺品中屢次看到,但在中国的遺品中还没有見過。我們期待着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出土品中發現这类实例。另外还有極少数的例子,在鉄制的刀劍上有用金鑲嵌銘文的,这种銘文希望得到中国擅長于金石文字的專家的帮助,辨明其讀法。又,馬具中也屢有金屬制的华丽的东西出土,这更可与中国南朝詩人的詩句对照,相信当然在中国遺品中也有同样的东西,而且根据“日本書紀”,五、六世紀左右,日本的坐床中有吳床和胡床二

种，可以想像“吳床”是中国固有的，胡床是椅子式的。后者（胡床）若与埴輪相参照，可以明白其实际的形状。

到了六世紀，佛教从百济傳入到日本，跟着，佛教艺术也在我国（日本）繁荣起来。供养庄严美丽的金銅佛是当时人們的願望，恐怕五世紀时，由于与南朝直接交通，佛像已經輸入了日本，而且制造法隆寺金銅三尊佛的名叫鞍作止利的有名的“佛师”，恰恰就是从南朝来的名叫司馬达等的虔誠的佛教信徒的孙子。他們一族在我国（日本）叫“鞍作”，就是从事馬具制作的。总之，馬具制作的工人需要有金工、木工、漆工等各种技术，因而熟練金銅技术，所以在日本最初制作的佛像，可以想像是由这些工人試作的。

到了奈良朝，就不仅輸入唐代的絢爛的中国文化了，而且通过唐朝和薩珊朝的波斯、东羅馬、印度、阿拉伯等西方文化也發生了交流。这以唐为中心的世界的文化，广泛流傳到东亚各地，我国（日本）平城京、新罗的庆州、渤海的上京等各处都出現了小長安，相互在和平里各自竞争文化的兴隆。奈良正倉院留傳下来的各种美术工艺品，最有力地說明了其間的消息。我們这次到中国来，学习以敦煌为首的、其他新發現的繪画、雕刻等，一方面研究日本美术的本源，一方面还想了解和正倉院傳來品有密切关系的唐代工艺品，并希望看到新出土的資料。

最后，还有一件期待中国考古学的事，就是所謂伽藍的配置（寺院的平面布置）問題。金堂（佛殿）和塔配置在南北一綫上，在我国（日本）叫做四天王寺式，根据“洛陽伽藍記”永宁寺的記載，可以追溯淵源于中国，又根据与日本文化直接有关的朝鮮百济的調查，也可以肯定此事；但此外，金堂（佛殿）的前边左右配置塔，日本叫做藥师寺式的，云岡石窟雕刻中有佛殿左右設置塔的，所以这也有在中国求得其本源的可能性。至于金堂（佛殿）和塔东西并列（布置）的伽藍配置如奈良法隆寺者，是中国的制度呢？还是日本創造的形式呢？希望中国考古学者能帮助解决这一問題。

